

李海泉

日本作为他者

原住民、发展与文化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李海泉

日本作为他者

原住民、发展与文化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北京·广州·上海·西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作为他者:原住民、发展与文化 / 李海泉.

—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9.10

ISBN 978-7-5100-1024-8

I.日... II.李... III.文化人类学—研究—日本 IV.C9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44671 号

日本作为他者:原住民、发展与文化

著作责任者:李海泉 出 品:吴兴元 责任编辑:方 理 黄燕华

出 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发 行: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北京朝内大街 137 号 邮编 100010)

销 售: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盛兰兄弟印刷装订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13 插页 9

字 数:160 千

版 次: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教师服务:teacher@hinabook.com 139-1140-1220

投稿邮箱:onebook@263.net

编辑咨询:133-6631-2326

营销咨询:133-6657-3072 010-8161-6534

ISBN 978-7-5100-1024-8/C·70

定价:2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北方农村尚可见到的发展步伐中残存的茅草房，在现代日本的农村也偶尔可以见到。它的意义不在于生存理由，而是昭示了在近现代化过程中民众对过往生活方式的乡愁，蕴涵了成为往事的传统的深意。房子每隔5年就需要精心大修一次，但掌握盖草房手艺的匠人越来越少。图中房子的主人已经年过八旬，仍在从事这项工作。据说这门技艺已经成为日本政府认定的文化遗产。

走出本土的樊篱

海泉是我的同乡,但是之前并不认识。有一次在农大我所主持的“乡土社会研究讲座”上,大约是法国的杜瑞乐教授来讲座,海泉从传出去的海报上知道消息也来听讲座,讲座之后,他来办公室找我,告诉我他曾经读过我的《权力与公正》一书,并且对我书中的照片很是感兴趣。

他大约高中的时候就去了日本,读到硕士就停下来,回到中国协助一些日本研究者做一些跟环境保护有关的发展项目。因为他原来在日本学的就是人类学,而我对日本以及日本的人类学所知甚少,由于是同乡的缘故,因此便有机会经常不是在北京就是在老家承德的餐馆里、咖啡馆里聊天谈人类学,特别是日本的人类学。从他那里,我确实掌握了许多关于日本人类学发展的状况,获益良多。

海泉的日语很好,在跟他接触的日子里,我曾经鼓励他多翻译一些日本人类学中有影响的论文,投稿到我做执行主编的《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上来。他后来是在河北旅游学院教授日语和日本文化,授课之余便潜心翻译,先后翻译了数篇文章,寄给我之后,都陆续安排发了这份现在有些影响的学报上,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

在他所翻译的文章中,有一位作者叫本多俊和的,我原来以为是地道道的日本人,但海泉后来告诉我,他是一位本土的英国人,后来由于对日本文化的兴趣而彻底加入了日本国籍。本多是海泉在日本的人类学老师,后来海泉还专门邀请本多教授来我的农大讲座上讲述他的关于日本原住民运动的研究。那天的讲座,本多教授很是卖力,海泉的翻译也极为精当,学生们的反应更是热烈。现在想来,那是一次很难让

人忘怀的讲座。

关于日本,对于中国人而言实在有着太多的联想。也许过于邻近的地理空间,使得相互的误解远远胜于真正的理解,特别是那场让人刻骨铭心的战争发生之后,对于战争的记忆就从来没有被遗忘过。一旦有些新闻式的报道开始大肆谈论有关日本的事情的时候,中国人就可能会感受到一种愤愤不平,冲口而出的都可能是负面的偏颇评论,此时历史又会被重新回忆起来,并会以此历史去附会一些今天日本发生的但实际我们可能并不十分理解的事件和行为。

不能否认,我们与日本的人员往来并非不频繁,我们对于日本文化的表现形式不可谓不熟悉,但是我们究竟在什么意义上做到了对于日本文化的理解?这可能就很难说了。也许我们的国民去了日本也只当是一种旅行而已,刻板印象还是深藏于内心,只认为自己的文化要优于作为他者的日本文化,去那里旅行也不过就是消遣和度假而已,昨天去了和今天去了也没有什么两样,其中没有怀揣丝毫的文化欣赏的心情。这也许许多过度强调本土文化的学者、旅行家乃至普通公民很容易就受到那种只拿本土文化来说事的民族主义者的煽动而做出一些不切实际甚至有时很粗鲁的行为的缘由所在吧。而如何面对他者的异文化,在过去是一个问题,在今天更是一个不能不去面对的问题。

海泉用回国这几年的时间搜集、整理和翻译了日本人类学家对于存在于日本社会中的各类异文化的研究。这些研究呈现给我们的是一种生活于日本社会中的人类学家对于异文化存在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充满了包容、同情与救助之心。在传统离我们渐行渐远的今天,对于传统,我们反而似乎有一种格外的渴求,这种渴求从日本的原住民的生活中还能够不断地得到展现,这令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传统的那份顽强的生命力。我们确实不可能再使历史的车轮倒转回去,当我们开始作出选择去亲近现代化之路开始,我们便命定地没有了回头之路,我们开始依赖于我们的一切选择,我们为我们所选择的现代化的结果所支配,最后,我们也仅仅只能是从他者的呈现之中才能回忆起我们用我们今天所获得的

东西换来的对于过去的遗忘与失去。

日本要比中国更早地追随西方的现代化的步伐,并非常迅速地实现了这种现代化。但是日本也很早地就开始了一种觉醒,他们对于自己社会中的生活于边缘地带的原住民的声音不再采取置之不理的态度,而是开始倾听,开始尊重这些人的呼声。他们也开始了小心谨慎地记录原住民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文化传统,尽可能原汁原味地保留这些即将消失的传统。

这样的做法也许是一种世界性的潮流,无可阻挡。我曾经听友人说过,在荷兰的博物馆里有荷兰殖民者早期到印第安人的土地上放出凶猛的猎犬咬伤并驱逐土著印第安人的照片。这些殖民者的后裔敢于将这些残忍的照片拿出来放在博物馆里展览,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时代的觉醒,这种觉醒也是一种自我的忏悔,是在为自己的祖先所犯下的罪恶而忏悔。在经历了现代化的疯狂的对于自然与人的生活环境的入侵之后,西方人觉醒了,开始作出自我忏悔;接着,日本人也觉醒了,行动起来为原住民的自我保护运动摇旗呐喊;甚至以后还有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澳洲等的觉醒;那么中国未来会是怎样呢?

我们可能不愿意承认我们社会中的“他者文化”的存在,我们也许更希望所有的人都一起迈进现代化的轨道中去,在这个可能是笔直溜光的大道上,我们加速度地抛弃了传统,抛弃了各种另类的人及其生活方式。当越来越多的人不愿意在这条笔直溜光的大道上费力地前行的时候,他们开始为自己的落伍寻找一些理据;为这种不合群的生活方式寻找过去的知音;为原来为他们所抛弃的他者描画出一幅精致的肖像画,挂在厅堂的正中央,使他们疲惫的心能够在此得到一些欢愉的慰藉。今天的中国社会,特别是在城市生活空间中,纷繁复杂的生活方式的存在和被认可已经开始向我们展示了在原来的目标一致的行动中,确实有人开始甘愿落伍了。这种落伍也许是一种真正聪明的人的聪明选择。

实际上,在我们开始知道去欣赏离我们的生活可能很遥远的异文化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获得了一种自我的觉醒。我们在描述异文化的同时

也在为我们原来轻而易举就丢失掉的生活方式寻找一种退缩回去的可能途径。就像马达需要定期保养一样,人的精神也需要不断地从孜孜以求的奋斗中停下脚步,倾听在快速的奔跑中所无法真正感受到的各类声音,其中也当然有噪音。这种倾听需要有一种悠闲态度的培养,需要一种悠闲情趣的培育,离开这些,我们即使停息下来了,心里还是被时间压迫着,焦虑地等待着明天的作为,这样的态度不会成就一种对于他者悠闲而怡情的欣赏与理解。

细细品味海泉所写所译的文字,总觉得我们对于“日本”这个他者理解得实在太少太少了,如果再除去那些由风靡全球的电影和电视剧所灌输给我们的关于日本人的刻板印象,那么我们对于日本的理解几乎就一无所有了。昨天与海泉在一家酒馆喝酒聊天,我半开玩笑地建议,如果他沒有女朋友就可以找个日本女孩子做妻子,他笑着回答我:“你也是受电视的影响太深了,实际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想来也是可悲,向来以人类学的他者关怀为学术追求的我,对于遥远的日本以及生活在那里的日本人也在劫难逃地被现代的传媒所迷惑住了。

也许,在今天这个时代里,一切都是值得去怀疑的,因为虚幻代替了现实,但是,唯独有一点你可能不要去怀疑,那就是马上背起行囊,到异文化中去。因为你的眼睛也许可以欺骗你,但是,你的眼睛加上你的感受,那就无法再欺骗你了。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赵旭东

二零零九年八月十八日写于鼠味斋

序 言

——日本作为他者

与近代人类学发源地的欧洲相同，拥有海洋国家经验的日本列岛，一直对外界的“他者”有着浓厚兴趣。日本远离大陆，海啸、地震、火山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相伴左右，对外界的探索有其现实需求。近代以来日本国家在经济、政治、社会等生活中所获得的成功，与其对外界的探求以及成功复制有着紧密关联。到现代又在复制过去的成功经验，经验不只是物或者组织制度本身，更重要的在于文化的汲取，并由此生成方法论。

20 世纪最后十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苏联解体，世界政治局势进入后冷战时代，更因为那一时期中国经济的疾速发展，令人们感到了久违的热烈和激动。时光流转到 21 世纪，一切似乎趋于平静之时，却因为“9·11”事件的发生，向世人猛击一掌，使人们发现，在政治经济的喧哗声中，的确隐藏着一个终极的文化对立问题。政治对立减弱以后，文化对立便彰显出来，让主流社会意识到关注他者，具体而言即关注拥有不同文化色彩的他民族，对主体社会自身是至关重要的。

在带有政治对立色彩的原住民问题之外，经济发展乃是战后广大新兴国家共同面对的最紧迫主题，是占世界人口最多的第三世界的问题，必然是近期人类历史最重要的现象之一。例如现在仍然在世，最富原创力的人类学家萨林斯，其近年在中国发表的带有结构主义性质的高论，几乎没有离开过原住民、发展、文化三个关键词。

本书无意回顾文化人类学学说的历史，但为了下文的论述，还要老生常谈地指出，曾经的西方殖民者对远方殖民地人民的研究是现代人类学的起源。古典的指标认为，被研究者在血缘、宗教、历史、体质、语言、行

动方式等诸多方面有共同特征的群体即为民族,其生活方式——包括真实的和现代人认为虚幻的宗教仪式等民俗活动——则被称为文化。不论是曾经占强势的进化论观点,还是标志了 20 世纪人类思想进步的功能主义、历史个别主义、结构主义,均以书写民族志(Ethnography)为人类学者的基本工作。日本新派的人类学者则更愿意将 Ethnography 译为生活志,也就是说比起“民族”的定义,他们更乐于称自己的工作为地域研究,其背景是民族、文化的概念已经被认为具有模糊不清似是而非的虚构性,更多的从其自然属性转向动态的认同研究。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有关日本原住民族的问题波澜起伏,但是日本本土文化人类学家的踪影并不多见,东方人不愿触及政治现实的“以和为贵”的传统思想已经渗透到了日本学者及其学术研究的基因里,并形成了自日本文化人类学这一学科开始以来面向海外的传统基调。

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有多元的生态、文化群落,人类学家大多立足于本土研究,是在研究他者还是在研究自身,其实界限模糊,这也凑巧暗合了后现代主义者对传统人类学调研方式的批判。后现代主义者对他者研究的正当性及研究理论本身存在诸多诟病,其言论无意间为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方式找到了某种理论正当性。时代在变迁,中国人类学的主体意识不断增强,研究人员也开始了海外调查。他们步入日本的田野,走出最初阶段旁观者新奇的文化发现之旅,融入当地人的生活,进入似理性又非理性的阶段,发现日本在“二战”后的盟军占领时期也曾存在同样的发展问题,依然存在着民族问题、文化问题。但日本的人类学家与我国不同,对国内研究没有表现出太多兴趣,原因也许在于其自身对国内问题的认知与外国人类学家是有所不同的。

在发达国家中,日本有关国内原住民族的问题被国际组织视为异数。一直以来,日本政府在向联合国提交的报告中否认国内存在原住民族,并且也未像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在政治经济生活中给予原住少数民族优惠待遇,在文化上组织上承认其独立地位。DNA 测试的结果显示,日本北方原住少数民族阿伊努人属高加索或中亚人种,在体质上与日本

人明显不同。1869年明治政府在没有签订任何协议的情况下,便将北部原住少数民族阿伊努人的土地据为己有。标志性的事件是日本政府在1899年制订了北海道旧土人保护法,目的看似要传授农业知识,救济阿伊努人,但以现在的解读,是将阿伊努人视为异端,主体的大和民族以“文明人”自居,要教化蒙昧的原住民。称阿伊努人为“旧土人”,这在言论层面和制度上制造了明显的歧视,区别了主流和少数族裔。

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也遇到了生态环境破坏问题,此时,日本人似乎意识到,不向大自然过多索取、不以追求商业利益为目的、与大自然共生的原住民阿伊努人,其生存逻辑是有可取之处的。加之大的国际政治环境也在发生剧烈变革,日本开始走出殖民时代的阴影,因此对阿伊努人的政策有所缓和,出现了进步的端倪。如果日本本土的人类学家能够积极参与到国内事务中来,境况也许会有更多的改善。20世纪80年代,日本又因当时的首相中曾根康弘关于日本是单一民族国家的发言引发轩然大波。1992年北海道同胞(UTARI,阿伊努人在险恶的环境中更愿意这样称呼自己,意思是伙伴、同胞)协会理事长野村赴联合国大会陈情,控诉日本政府实施同化政策,否定其传统文化,并剥夺了他们的领土和生活手段。1997年日本政府终于宣布废止实施近百年的、有明显同化目的的北海道旧土人保护法,代之以阿伊努文化振兴法。2007年联合国通过了原住民权利宣言,在国际潮流及舆论导向作用下,2008年6月,日本参众两院一致通过了关于阿伊努为日本原住民族的决议案,并成立了实施工作组,以进一步完善针对阿伊努的政策措施。时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的町村信孝随即发表讲话,承认阿伊努在宗教、文化、语言等方面有着不同于主体社会的独立性;在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中,阿伊努人受到了不公正待遇,备受歧视,深陷贫困,对于这一历史事实,日本应以严肃态度予以接受。

近年来日本的考古资料证实,阿伊努人曾经以简单的渔猎方式获得了充足的食物和产品。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关于狩猎采集民的资料也向近代所谓“发展”、“进步”的观念提出了挑战,也就是说其生活并

非简单的糊口度日。日本等发达国家在通过努力工作,有了足够消费的工业产品,以至于随意丢弃成为社会问题之后,意识到出土文物或者还存世的器物蕴涵着狩猎采集民在闲暇时拥有的“美好”时光,是为后人创造的文化财产。游猎民族逐水草而居,物质是身外之物,这并非说他们情趣高尚,而是由于物质会带来移动的负担。狩猎采集的原住民依赖土地和自然,相信万物有灵,这必然会对自然对生命有所敬畏。现代社会里诸多有悖伦理的异常不祥事件的发生,使人们意识到与狩猎采集的原住民相对照,在发展进程中人类自身出现了缺欠,失去传承有其可怕之处。农耕民族要以粮为纲,安居乐业,谋求积累。而自古以来,农耕民族经常成为社会主体,其对物质无限积累的文化,让自然生态无法承载,山川河流不再富饶,使得与自然共生的原住民由富变穷。日本从对鲸鱼的崇拜演变到现在的商业捕鲸活动,已经影响到海洋生态,涉及到了北极地区原住民的生计。20世纪以来,不论我国北方少数民族还是北极的爱斯基摩人地区,国家均为原住民实施了安居工程,目的也许是希望原住民像主体社会一样安居乐业。但移居、改变原住民的文化生态,令当事人及参与者茫然若失,所产生的社会问题之多,对作为复杂体系的原住民文化理解之难,可以说为世界各国的人类学家提供了诸多难得的工作机会和思考材料。从明治年间开始的北海道开发无疑给阿伊努人带来了灭顶之灾。根据2006年的统计,阿伊努人口仅存2.6万人,而且基本是长期以来与大和民族通婚的后代。

日本充满异国风情的地方除了北方的北海道,还有亚热带的冲绳。在经济发展的浪潮中,冲绳属于日本最不发达的地域之一,日本内阁曾经专设有北海道、冲绳开发部门。日本国内对冲绳问题追问的热情远高于中国,但多见于政治学或民俗学领域,也就是说冲绳并未被视为人类学的他者。虽然1972年在中国政府帮助下,美国将冲绳归还了日本,但至今冲绳还是满眼的海军基地,令冲绳人不愉快的美国士兵仍然游荡在街头。中国的研究人员自然会联想到当1853年西方殖民者的舰船第一次来到日本列岛时,现在属于冲绳的琉球王国还在使用咸丰年号,向清

政府进贡。另外是不同于日本本土的冲绳原住民文化,例如经常令日本人不解的是,冲绳人食用猪肉较多,且连皮一起吃,而我们知道这是中国占主体的汉族人自汉朝以来形成的饮食文化。在日本料理店里偶尔会见到与中国菜品酷似的食物,一般认为这只有在中国才能见到,餐厅主人会告知,这来自冲绳。

在冲绳的访问中,当地人偶尔会将自己的位置与香港作比较,说中国变强了,成功地从英国人手中收回了主权,而日本政府对冲绳真正行使主权还遥遥无期。对于完全没有过殖民地屈辱记忆的日本来说,冲绳问题不会令日本政府痛心疾首。而当地原住民的记忆则不那么简单,他们不情愿地从大陆的清王朝分离出来归顺岛屿国家日本仅一百多年,仅是三代人以前,上书李鸿章却无力回天,恍如昨日。600年前建成的琉球首里城现在是世界文化遗产,雕梁画栋,金黄色的琉璃屋顶,朱红色的立面,建筑风格立即使人想起这乃是中国传统的宫殿架构。在那里举行仪式时使用的道具、服饰、礼仪,与日本本土截然不同,更像是中国的民间庙会,模仿的是中国皇室的礼制。冲绳的日本人是一个微妙沉重的话题,因为这种认同牵涉了多重的意识,在近代殖民主义时期命运多舛,在战后现代国家的政治分界中,依然多灾多难。麦克阿瑟就曾经表示,冲绳人不是日本人,所以日本人不会反对美国拥有冲绳。虽然在体质上冲绳人并不像阿伊努那样与日本人有明显差异,但由于文化的差异,以及历史上的聚少离多,他们依然要面对来自主体社会的歧视。

偶尔有日本新派的人类学者从社会运动、政治运动以及文化运动的角度关注冲绳或原住民动向,因为原住民和主体社会的关系经常很容易被解释到文化范畴。研究这一问题的日本人类学家是在海外研究第三世界国家民族独立、自治运动时联想到冲绳问题的,就像原住民运动本身的动因也经常来自与主体社会有关的某些思潮。在西方人类学论文里经常提到,原住民运动的起因是美国印第安退伍军人在政府奖学金帮助下接受高等教育,同时也接受了主体社会自由、民主、权力的思想熏陶,成为原住民运动的始作俑者。也就是说,政治自觉、文化自觉的想象力需要

借助他者,文化从来不是封闭的体系。

国际形势是 20 世纪中叶以后殖民体系逐渐瓦解,人类学语境开始改变,曾经的调查方向也越来越不适应形势的变化。经济上,80 年代以后欧洲发达国家的经济几乎陷于停滞,用于人文社会科学资金被削减,对远方的向往无法得到足够的经费支持。而此时,东方的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民主政治及社会状况在进步。同时,学界已经形成共识的是日本和欧洲相同,有着海洋国家的经验,这也是 19 世纪中叶以后,日本能够不同于其他亚洲国家,摆脱不利形势得以发展壮大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且还要进一步指出,日本人类学领域的基因在于它和西欧一样均为殖民国家的经验,在聚散离合中,日本或多或少也许还残存着战败带来的痛苦记忆,但完全不同于曾经沦为殖民地国家的感受,这便在人类学写作风格上得到了体现。

战后的欧美人类学研究收缩战线,更多地转向他者异文化研究,比如城市的边缘群体,或者如美国借助后院的印第安人推进人类学发展。而日本则继续人类学传统,向海外派遣研究人员,壮大队伍,积累成果。这一研究取向至今还在延续。

本书中,本多俊和(Steward Henry)先生以明确的他者思考角度对“原住民”问题进行研究便是一个典型例证。本多俊和放弃母语,坚持使用日语表述,自 1975 年起,长年对加拿大北部因纽特人(在阿拉斯加称爱斯基摩人)及北方原住民族,采用考古等各种研究方法,多角度进行调查。其研究成果显示,在人和猎物之间形成社会关系、进行食物分配时,因纽特人(Inuit)的世界观中,妻子担当着生命循环和生命保障作用。虽然社会组织研究是主流,但与社会学不同,人类学家要进行亲族社会组织中的文化解释,要阐明生物学上的“父亲”与社会组织上的“父亲”的区别,法律意义上的“妻子”与社会组织上的“妻子”的不同。在有着物质财富累积、法律制度保障的现代城市社会中,人们趋向于尽量缩小家族规模。而在未累积物质财富的社会组织中,不管血缘关系有或无,家族的扩大总意味着财富的累积、生存实力的壮大。

本多先生长年累积的文化人类学成果,成为今天讨论原住民问题的支撑材料。本书的第一篇论文写于1993年的“国际原住民年”,缜密地论述了谁是原住民,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各国原住民运动的历史、现状,展望未来,认为不容乐观。作者也就此评判自身所处的日本文化人类学界佯装“客观”进行的所谓“非政治”研究,指出文化人类学应该追究研究的意义和结果,尽到学术的道义责任,避免应用人类学御用于同化政策的倾向。显而易见,作者试图从人类学的角度阐释世界范围内存在的原住民政治地位问题。

国际原住民年之后的十年间,即1993—2004年,原住民及其所处境况引起了国际社会的高度关注。本书第二篇论文便论述了国际原住民年及随后十年期间的合作与纷争。作者的理论基点是,20世纪后半叶原住民运动的根源可以追溯到英国法系中的习惯法和1763年的英王诏谕。文章首先简要勾勒了原住民运动的发展概略,特别是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的事例,进而指出原住民目前所面对的困境,具体事例包括近些年来加拿大发生的武力冲突,澳大利亚和美国原住民圣地受到的破坏,围绕资源利益在企业 and 原住民之间发生的管理权和所有权之争。与此同时,原住民文化遗产的管理和保护也是备受瞩目的话题。

作者认为,国际原住民年之后的十年里,世界原住民境况在诸多方面有明显改善,但不能满足于此,因为原住民又面临着新的威胁与挑战,“反恐”给了政府动用军队镇压原住民活动家及其后援组织的借口。还有一个动向主要发生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很微妙但同样不容小视,就是主流社会对给予原住民“特殊待遇”的不满情绪。

原住少数民族绝大部分居住在第三世界国家,因此居住在这些国家的原住民也被称为第四世界。在我国,人类学概念上的原住民,可以认为与居住在边疆地区、被称为“少数民族”的群体相重合,虽然有“东突厥”、“藏独分子”等民族(原住民)问题不断显露,但在社会主义多元一体化格局或者说华夷秩序观中,发端于20世纪60年代、80年代以后发展为世界规模的原住民运动在我们眼中可以视为他者的话语。